

沈宋貶謫詩在詩史上之新創意義

蔡振念*

〔摘要〕

貶謫與流放，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悠久的傳統，早在堯舜時代，已有記載，《尚書·舜典》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又《左傳》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此後被流貶者無代不有。

本文首先論述了唐代仕宦文人被貶的一般情況，說明貶謫在唐朝是很多詩人的普遍經驗，也往往影響了詩人作品的風格，被貶詩人，大都以詩傳達貶途的苦辛和對家園親友的思念。在這一方面，沈、宋和其他詩人並無不同，但沈、宋的貶謫詩卻至少在三個面向突出了他們與眾不同的創新，並成爲後來貶謫詩的典範，一是在詩中積極抒發被貶的冤屈不平和憤悶，二是在詩中寄託戀君思闕之情及蒙恩赦還之願，三是藉佛道山水排遣被貶之愁苦。

關鍵詞：貶謫、流放、宋之問、沈佺期、創新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收稿日期：2007年9月6日，審查通過日期：2007年11月10日

責任編輯：張高評教授

壹、唐代貶謫詩的背景

貶謫與流放，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悠久的傳統，早在堯舜時代，已有記載，《尚書·舜典》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服。」又《左傳》文公十八年：「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此後被流貶者無代不有，唐代之前被貶的知名之士如戰國時之屈原，漢之賈誼，三國吳之虞翻等是。屈、賈被貶之後所寫之辭賦也成為貶謫文學之濫觴。

貶謫與流放是中國歷史上普遍的現象，所以沈約〈立左降詔〉云：「減秩居官，前代通則，貶職左遷，往朝繼軌。」（明梅鼎祚編：《梁文紀》卷七）貶官往往被遷往偏僻窮遠之地，形同流放，所以也叫流貶，但貶謫與流放畢竟不同，《唐會要》卷四十一記唐穆宗長慶四年刑部奏文云：「流貶量移，輕重相懸……流為減死，貶乃降資。」¹流放的刑罰要比貶謫重得多，在唐代五刑中僅次於死刑。但就其「徙之遠方，放使生活」來看，貶謫與流放帶給人的痛苦與心理打擊，本質上沒有不同，給予文人作品的影響也可等量齊觀，因之我們可以將受貶謫與流放後文人所寫與此主題相關的作品稱之為貶謫文學。

中國古代的知識份子大都是以做官出仕為最終目標，所謂「學而優則仕」是也，一旦踏上仕途之後，宦海浮沈，黨爭不斷，貶流就成了普遍的經驗，如《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載玄宗開元元年，因窮治太平公主枝黨，使「百官素為公主所善及惡之者，或黜或陟，終歲不盡。」如此一來，貶流之人也就絡繹於途，他們之中不少是有才氣的文人，發為不平之鳴或怨屈之聲，形成了可觀的文學作品，所以有學者認為：因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作家，都有經歷貶謫的遭遇，所以就是說「中國古代文學史是一部『貶謫』文學史也不過分。」²雖然有點過分強調貶謫文學的重要性，但如果我們說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作品，往往是貶謫文學應不為過。

在傳統文學研究上，我們很少將貶謫文學獨立出來，看做一種文類，主要原因可能是定義不明，狹義來說，貶謫文學特指作品中言及被貶或流放事件與生活者，但廣義來看，因貶流影響而寫作的作品，舉凡抒發鬱悶，託物寄興者，以及

¹ 王溥：《唐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738。

² 見徐書奇：〈古代貶謫文學探析〉，《文學研究》2005年9期，頁21。

貶途上的紀行山水詩，皆可視為貶謫文學。就此而言，貶謫文學可以十分寬泛，屈原所有的作品和賈誼大部分作品，柳宗元、劉禹錫被貶後，多數作品皆可視為貶謫文學。我們看，文學史上有所謂山水文學、園林文學、宮廷文學、邊塞文學、閨怨文學，甚至色情文學等議題，但貶謫文學則少有人言及。一直要到近年來，文學研究者才注意到文學上這一現象，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八日，由中國韻文學會發起的「首屆遷謫文學暨王昌齡學術討論會」在湖南懷化、張家界召開，次年又在懷化和衡陽市召開第二屆討論會，並出版為《貶謫文學論集》。可見隨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拓寬和深化，貶謫文學也得以成立，所以大陸學者陶敏就認為：「貶謫文學這一論題的提出正反映了文學研究深入發展這個時代潮流。」³我們先探討唐代貶謫文學的歷史背景。

由於從隋代以來正式建立了科舉制度，文人出仕不再由門第族蔭，而有了制度性的管道，唐承隋制，除了皇帝特殊拔擢或權臣力薦之外，一般平民做官，率由貢舉科考，讀書人十年寒窗，為的就是求得一官半職，所以唐太宗看到舉子應試，才會意氣風發的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然而一旦走上仕途，或者由於黨爭，或者由於帝位更替，一朝天子一朝臣，或者由於觸犯刑法，貶流成了許多唐朝官吏共有的經驗。據《資治通鑑》卷二百〇四載，武后永昌元年，周興誣奏魏玄同刺太后，魏被殺，「自餘內外大臣坐死及流貶者甚眾。」武后病篤，中宗即位，武后寵臣張昌宗、張易之及依附張氏兄弟之人被貶流者十餘人；又如開元年間，張說、張九齡罷相，受二張提拔者有許多受牽連而被貶；安史之亂，肅宗在亂事中即位，玄宗不得已遜位，稱太上皇，玄宗的一千老臣也被藉故外放；順宗即位，有意改革朝政，任用王叔文，號稱永貞革新，然不過數月，順宗被逼退位，王叔文及其任用的一群人同日被貶，史稱「二王八司馬」事件；憲宗元和年間，李宗閔與牛僧孺參加制舉，在對策中指切時政，並皆登第，宰相李吉甫向憲宗泣訴，於是復視的考官裴垍等被貶，開啓了四十餘年的牛、李黨爭序幕，最後李德裕貶死崖州。此外，唐朝諫官上書言事，往往觸怒皇帝或權臣，被貶時有所聞，文人中杜甫、張九齡、韓愈都是著名的例子。貶謫原因複雜，約略言之，可得數端：一、因黨爭或政局變革而遭貶，如上舉永貞革新及牛李黨爭等相關官員，二、因株連而遭貶：如王維任大樂丞時，因伶人在太樂署舞黃獅子一事受到株連（黃獅子舞只能為皇帝而舞），當時的宰執為張說，和太

³ 見其〈湖湘貶謫文學研究展望〉，載《求索》2001年6期，頁104。

樂令劉貺的父親劉知幾一向不和，劉貺被貶，王維也連坐，謫為濟州（今山東濟南西）司戶參軍。又如李白在安史亂後隨永王璘起兵，永王璘失敗後，李白被流夜郎。以歷史眼光來看，當時天下大亂，朝廷危危可及，永王起兵勤王並沒有錯，問題在肅宗怕永王威脅他的皇位，所以視兄弟如寇仇，李白也遭到株連。三、因觸犯刑罰而遭流貶，唐初駱賓王被貶臨海丞，《舊唐書》本傳說他是坐贓，但真正原因可能是如《新唐書》本傳所言上書忤旨。宋之問被放越州，也是因為受賂，而太平公主和安樂公主爭權才是真正原因。這些人犯罪雖然被冤，卻不乏有真正犯法而被罰者，如王勃因匿死罪官奴，恐事洩，又殺之，被自虢州參軍除名，其父也受牽連，貶為交趾令。四、因上書言事而被貶：如杜甫在房琯兵敗陳陶斜之後，上書力陳非戰之罪，忤肅宗之意，由左拾遺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韓愈為監察御史時，上疏論宮市，觸怒德宗，貶為陽山令，又在憲宗朝諫迎佛骨，惹怒皇帝，貶潮州刺史。此外如白居易在元和十年因傷名教貶江州司馬，「傷名教」恐怕是欲加之罪，白居易忠直敢言，越位上書，不為當權者所喜才是真正原因。

其次，唐代貶流，罪刑較輕者才有可能外放在關中、河洛或附近州縣，其他每每謫至海陬邊邑，極盡荒涼之地，若是嚴譴，則限日起程，沿途不得停留，行旅備極艱辛，對遭貶者身心打擊甚巨。《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八劉禹錫傳提到謫臣遠放，其議始於張九齡，傳曰：「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之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置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忤心失怨，陰責最大，雖它美莫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這段話出自劉禹錫的〈讀曲江集作〉詩引，原文云：「世稱張曲江為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鄉。」（《劉賓客文集》卷二十一）所謂「世稱」，可見只是傳言，其實古來流官多遠地並不始於唐張九齡之建言，唐代只是繼承了流官的傳統。荆襄、嶺南、巴蜀都是貶謫之人常到之地，南方炎熱，北人不習風土，往往死於貶所，位於今廣西省北流縣的鬼門關，有諺云：「鬼門關，十人九不還」，沈佺期放驩州，經其地，有〈入鬼門關〉詩云：「土地無人老，流移幾客還？」（詳下文）可見其險惡。元稹徙通州司馬（今四川達縣），通州：「叢穢卑穢，蒸癘陰鬱。」（〈虫豸詩七首并序〉《元氏長慶集》卷四）柳宗元筆下的永州則是：「人多疾秧，炎暑熇蒸，其下卑濕，非所以養也，診視無所問，藥石無所求。」（〈先太夫人河東縣太君歸誌附誌〉，《柳河東全集》卷十三）韓愈被貶潮州，有〈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詩云：「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全唐詩》卷三四

四，除沈、宋詩之外本文引詩皆據《全唐詩》）可知貶流之人，對前程大多悲觀，韓愈雖得幸還，但如柳宗元、李德裕等人皆身死貶所，而由於行旅艱困，不許停息，道途路死者更是不計其數。

據《唐會要》卷四十一天寶五載〈左降官及流人〉敕文規定，郡縣不可允許流貶之人停留，左降官需「日馳十驛以上赴任」。唐代凡三十里一驛（《唐六典》卷五〈尚書兵部·駕部郎中〉），正常速度是「乘傳者日四驛，乘驛者六驛」（《新唐書》卷四十六〈百官志·尚書省·禮部·主客郎中〉），被貶之人要比一般人速度快高出一倍，身心俱疲，難怪司馬光敘此詔令時云：「是後流貶者多不全矣。」（《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五天寶五載下）柳宗完〈別舍弟宗一〉詩云：「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全唐詩》卷三五—）充分寫出貶謫的一般情況。⁴

朝廷貶令方下，謫宦之人大都倉促就道，張籍〈傷歌行〉寫楊憑貶臨賀尉時是：「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繫御史府。出門無復部曲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尉南海州，受命不得須臾留。身著青衫騎惡馬，中門之外無送者。郵夫防吏急誼驅，往往驚墮馬蹄下。」而張九齡貶荊州時自陳：「聞命皇怖，魂膽飛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馳。」（〈荊州謝上表〉，《全唐文》卷二百八十八）韓愈被貶陽山令時更慘：「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臥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領頭。」（〈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全唐詩》卷三三六），再次貶潮州時，「即日奔馳上道」（〈潮州刺史謝上表〉《全唐文》卷五四八），其女兒時正患病，但「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壙銘〉《全唐文》卷五六六），結果女兒病死道途，草草收葬路邊。

一旦上路，則期程有限，辛苦倍於尋常。當時若貶江淮嶺南，有兩條道路可走，一為東出潼關到洛陽，南到荆襄，走漢水南行，或由洛陽走汴河經運河南行，一為東南出藍田、武關至鄧州，走藍武驛道南行，⁵這也就是所謂商於道，這條路路程較近，但險仄難行，行人往往起早兼程，溫庭筠〈商山早行〉詩云：「晨起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

⁴ 當然，也有被貶不久即召回復用者，但就貶謫文學而言，這些幸運兒通常不會留下深刻的作品，因此吾人只需指出這一現象，以見貶謫的複雜性和多樣性，但就文學史而言，其意義不大。

⁵ 參考嚴耕望：〈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冊。

思杜陵夢，鳧雁滿迴塘。」（《全唐詩》卷五八一）⁶於晨霜中早行，亦辛苦矣，何況路途又如李商隱〈商於新開路〉詩所言：「六百商於路，崎嶇古共聞。」（《全唐詩》卷五四〇）逐臣由於嚴詔催迫，郡吏不敢相留，就不免僵仆於路了。路上的艱苦，在貶謫文人的詩中，不勝枚舉，如宋之問〈入瀧州江〉、元稹〈青雲驛〉、白居易〈初出藍田路作〉等是。

唐代詩人被貶是一普通的經驗，本人翻檢《全唐詩》，發現至中唐元和之前被貶謫的詩人有九十人左右，但並非每人皆有以貶謫為題的詩流傳下來。再據辛文房《唐才子傳》所載，被貶謫的詩人有五十人，他們大都有詩流傳，而以貶謫為題材的詩更不在少數。這些詩，構成了貶謫文學重要的一環，它們或描寫貶地風土，或紀行旅，或寓貶謫心情於山水，和純粹的紀行詩、山水詩有共通之處，也有區別，我們在此僅把可以明確知道有和貶謫遭遇相關的山水、紀行、感懷等詩歸為貶謫文學，以明定義，而不作過於寬泛的討論。另外，還有些詩人本身並未遭貶，但寫作詩文寄贈流貶之人，或送行，或慰問，或慶赦還，或弔殞傷，這些作品和貶謫主題關係密切，應視為貶謫文學之旁支。

貶謫的經驗對文人的影響是重大的，往往改變了當事者作品的風格，導致最好作品的產生，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云：「唐人好詩，多是征伐、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以激發人意。」其實，行旅和離別之作，很多也是因遷謫而來，可見遷謫將作者從尋常環境中抽離，確實刺激了創作，無怪紀昀〈月山詩集序〉云：「三古以來，放逐之臣，黃馘牖下之士，不知其凡幾，其托詩以抒哀怨者，亦不知凡幾。」翻檢《全唐詩》，確實讓人領受到紀昀的先見之明。

我們再來探討貶謫對詩人創作的影響。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有言：「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太史公這段文字寫出了古人在遭遇人生重大挫折或苦難之時，往往砥礪節行，藉著作與書寫來抒發心中之不平與鬱悶，所謂不平則鳴是也。韓愈〈送孟東野序〉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為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全

⁶ 溫庭筠於宣宗大中九年（八五五）以攪擾科場貶隨縣（今湖北隨縣），又於懿宗咸通七年主試榜文而貶方城尉（今河南南陽東北），兩次皆有可能走商於道。

唐文》卷五五五) 貶流詩人藉詩歌抒發不平，也是人情自然之事。

再者，貶流之人由於身心皆被抽離日常生活的環境，外在與內在的刺激啓發了他們創作的靈感，擴大了詩歌的意境和題材。杜甫貶華州司功參軍，論者以爲杜甫因此離開天地日窄之京師，「因之詩之內容則日益豐富，詩之國土則日益擴大」；⁷張說謫岳州後，「而詩益淒婉，人謂得江山之助云。」(《新唐書》卷一百二十五張說傳) 張九齡貶後之作，劉禹錫評曰：「今讀其文章，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自退守荊州，有拘囚之思。托諷禽鳥，寄辭草木，鬱然與騷人同旨。」(《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劉禹錫傳) 柳宗元：「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爲騷文數十篇，覽之者爲之淒側。」(《舊唐書》卷一百六十柳宗元傳) 元稹貶通州，白居易貶江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贈答，凡所爲詩，有自三十、五十乃至百韻者，江南人士，傳遞諷誦，靡不淒婉。」(《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劉禹錫傳) 韓愈詩的四百首，僅貶謫期間所作即達百首，這當然大多是他的不平之鳴，而柳宗元、劉禹錫大部分作品都創作於貶謫期間，也和他們貶謫時間特別長有關，柳宗元從永貞元(八〇五)年貶永州到元和十四年身死柳州貶所，在外十四年，劉禹錫從永貞元年貶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到大和二年(八二八)入朝爲主客郎中，貶官二十三年。詩人不幸，卻是詩歌的大幸，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正確的指出了貶斥使柳宗元留名身後：「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全唐文》卷五六三) 柳宗元被貶後寫了〈弔屈原文〉，其實也是自弔，但如同屈原若不是被斥逐，就不會有〈離騷〉等傳世之作，柳宗元如非被斥，大概也不會有〈江雪〉、〈永州八記〉等膾炙人口的作品流傳了。李白在〈澤畔吟序〉中很適切的指出貶謫帶給詩人的創作刺激，他說〈澤畔吟〉的作者崔公「流離乎沅湘，摧頽於草莽，同時得罪者數十人，或才長命夭，覆巢蕩室。崔公忠憤義烈，形於清辭，慟哭澤畔，哀形翰墨，猶風雅之什。」(《全唐文》卷三百四十九)

貳、沈宋貶謫詩的創新

如前所言，貶謫雖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悠久的傳統，但除屈原和賈誼以大量辭賦來抒發他們被貶的鬱悶之外，唐代之前，被貶的經驗很少見諸詩歌，這就使得

⁷ 四川文史管理委員會編：《杜甫年譜》，(台北：學海出版社，1981【1958】年)，頁98。

唐人的貶謫詩成了中國詩歌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種現象。我們查遍遼欽立所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可以發現，曹植和謝靈運是少數以詩歌來紀錄被貶經驗的詩人，但嚴格說來，兩人都不是唐人意義上的貶謫。首先，他們兩人都出身王室或權貴之家，身為封建王侯，和唐人經科舉入仕後，因政爭或因罪被貶立足點並不相同。曹植因為威脅到曹丕魏王之位的繼承，所以受到哥哥的猜忌，等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一死，曹丕篡帝位，曹植就被命令就封國，離開京城，且以監國灌均就近看管，數年之間，五次徙封，不使曹植培養自己的勢力。黃初四年，（223年）五月，曹丕又令諸弟入京朝覲，結果任城王曹彰被毒死，曹植和異母弟曹彪出京想要結伴而行，曹丕因怕他們暗中勾結，竟不許。曹植因此寫下有名的〈贈白馬王彪〉組詩七首，紀行之外，也抒發親愛離居、憂思難收的痛苦。魏明帝即位，曹植又屢上表求通親自試，但都不獲省，因此他的許多詩作如〈七哀〉、〈雜詩〉都表達了被棄不用的愁悶。

謝靈運是晉車騎將軍謝玄的裔孫，一出生就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宋武帝劉裕篡晉後，降先朝封爵，靈運被降為康樂侯，食邑五百戶，但他真正被貶，是權臣徐羨之、傅亮等見他和顏延之、釋慧琳等人依附廬陵王劉義真，怕他們威脅新即位的宋少帝，才將之出官。謝靈運乃於永初三年（442年）出守永嘉，沿途寫了許多紀行詩，如〈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過始寧墅〉、〈富春渚〉、〈初往新安至桐廬口〉、〈夜發石關亭〉、〈七里瀨〉等是，但這些紀行詩和唐詩人赴貶所寫之紀行詩在情感上很不相同，唐詩人貶謫途中所寫紀行山水詩，大都藉山水寄託被貶之鬱悶或以之排遣苦悶心情，然謝靈運這些詩卻每有一種賞玩意興在其中，這可能和靈運素愛山水的個性有關，史書說他「尋山嶺陟，必造幽峻，巖障千里，莫不備盡。」（《宋書·謝靈運傳》）我們看，他在〈富春渚〉一詩中說：

平生協幽期，淪蹟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宿心漸申寫。⁸

又如〈初往新安至桐廬江〉一首云：

絺綌雖淒其，授衣尚未至，感節良已深，懷古徒役思，不有千里棹，孰申

⁸ 據顧紹柏校注：《謝靈運集校注》（台北：里仁書局，2004年），頁69，以下引謝詩據此，僅標頁碼，不另註明。

百代意，遠協尚子心，遙得許生計，既及冷風善，又即秋水駛，江山共開曠，雲日相照媚，景夕群物清，對玩咸可喜。(頁 72-3)

詩中以東漢的尚長（或作向長）及東晉許詢自許，希望自己能 and 他們一樣遨遊五嶽，漁弋山水，接著詩人又以能和眼前清曠的景物對玩自喜。對謝靈運而言，貶謫不是他所憂心的，山水之媚才是他眼光所注視的。

唐人的貶謫詩和曹植、謝靈運都不同。曹植身為皇族，他只有被棄而不用的幽憤，而沒有被貶的屈辱，謝靈運也沒有唐人被貶後不得歸鄉的憂懼，所以他在〈過始寧墅〉詩中就說：「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事實上，他在永嘉才一年多，就去職回到會稽的故鄉，極盡幽居之美。因此，唐人的貶謫詩可以說在許多方面都是詩歌史上的新創，尤其以沈佺期和宋之問最為代表。沈、宋之前王勃、駱賓王等人雖也因事被貶，也都有貶謫詩，但他們的詩只表現了貶謫之後思鄉懷人的一面，沒有沈、宋詩的複雜與多樣。我們先看王、駱之貶及其貶謫詩。

王勃（約六五〇—六七六），⁹字子安，絳州龍門人，《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上，《新唐書》卷二百〇一文藝上有傳。據徐松《登科記考》卷二，王勃於高宗麟德三年（六六六）登幽素科，後為沛王李賢召為修撰，總章二年（六六九），王勃為沛王檄周王雞，¹⁰為高宗斥逐出沛王府，因而客居劍南，三年之後才又回京參選。

王勃被逐入蜀，寫了許多去國懷鄉的詩，表達了被迫浪遊的感傷與愁緒，「對仕途遭受的波折，心裡很覺憤憤」，¹¹王勃入蜀，正逢盧照鄰在新都尉任上也因事為人所構，被迫去職，兩人於是「婆娑蜀中，放曠詩酒」，寫了不少詩抒發鬱懷。¹²王勃〈蜀中九日〉詩云：¹³

⁹ 王勃生卒年據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2【1987】年），頁 31-32；岑仲勉《唐集質疑·王勃疑年》，載《唐人行第錄》（北京：中華書局，2004【1962】年），頁 356-8 及劉汝霖《王子安年譜》所考相同，唯姚大榮《王子安年譜》定王勃卒於高宗上元二年冬（六七五），參照王勃詩文，姚譜不確。

¹⁰ 《唐才子傳》作「檄英王雞」，不確，周王（即中宗李顯）至儀鳳二年（六七七）始徙封英王。

¹¹ 見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 年），頁 99。

¹² 張鷟：《朝野僉載》卷六。

¹³ 一作〈九日登玄武山旅眺〉，計有功：《唐詩紀事》（台北：木鐸出版社，無出版日期），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
人情已厭南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全唐詩》卷五六)

詩中除表達懷鄉之苦外，更以鴻雁作比喻，一方面連繫自己如鴻雁南來，另一方面又以鴻雁爲對比，因爲鴻飛有時，春天來時，即可北返，而自己卻歸期難料。¹⁴

在另兩首送別薛華的詩中，王勃再次申敘了旅泊的窮愁：

送送多窮路，遑遑獨問津。悲涼千里道，悽斷百年身。
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同上)

明月沈珠浦，風飄濯錦川。樓臺臨絕岸，洲渚互長天。
旅泊成千里，棲遑共百年。窮途唯有淚，還望獨潸然。(同上)

在《王子安集》中，這種表達倦遊與懷鄉之苦的詩至少還有〈麻平晚行〉、〈羈遊餞別〉、〈深灣夜宿〉、〈羈春〉、〈臨江二首〉、〈江亭夜月送別二首〉、〈別薛華四首〉、〈山中〉、〈冬郊行望〉、〈普安建陰題壁〉、〈秋江送別二首〉，從詩中地名、景物考校，這些詩大都寫於被逐沛王府後在蜀中三年所作，如〈麻平曉行〉之麻平在今四川樂山縣東，〈普安建陰題壁〉之普安在今四川劍閣，〈江亭夜月送別〉第一首云：「江送巴南水」，〈重別薛華〉之「風飄濯錦川」，句中的巴水、錦江皆蜀水可證。足徵王勃被逐流寓四川後，表現了典型謫放詩人懷憂離愁，思鄉懷人的情感。

駱賓王（六一九—六八四？），¹⁵字觀光，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賓王於

卷八，頁 106-7，邵大震條下記王勃此詩及盧照鄰同題之作，以為乃酬和邵大震詩。

¹⁴ 駱祥發釋末聯以為「人情」一句指盧照鄰，「鴻雁」一句質疑盧己倦游，自己何以又要從北地飛來。但對照盧詩末聯云：「他鄉共酌金花酒，萬里同悲鴻雁天」，鴻雁不應特指王勃，駱釋見《初唐四傑研究》，頁 96。

¹⁵ 駱賓王生平，聞一多《唐詩大系》以為生於公元 640 年，今據駱祥發：〈駱賓王生平考辨〉（載《唐代文學論叢》1982 年 2 期）考證，訂為公元 619 年，其卒年則眾說不一，《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傳上云與徐敬業起兵敗後伏誅，《新唐書》卷二百〇一文藝傳上云其兵敗亡命，不知所之，張鷟：《朝野僉載》卷一言其兵敗投水而死，孟榮：《本事詩·徵異》則言其隱居靈隱寺，且遇宋之問於寺中，孟說荒謬不足據，駱祥發《初唐四傑研究》已辨之。

高宗乾封二年（六六七）對策入選奉禮郎，旋遷東台詳正學士，咸亨元年（六七〇），因事被罪，上書裴行儉，求從軍以自效，¹⁶此後，駱賓王寫了許多從軍邊塞的詩，描寫軍中生活與邊塞風光，也寄託了去國懷鄉的情思，如：

鄉夢隨魂斷，邊聲入聽喧。南圖終鍛翮，北上遽催轅。
弔影慚連茹，浮生倦觸藩。（〈早秋出塞寄東台評正學士〉《全唐詩》卷七九）

二庭歸望斷，萬里客心愁。（〈夕次蒲類津〉，同上）

旅思徒飄梗，歸期未及瓜，寧知心斷絕，夜夜泣胡笳。（〈晚度天山有懷京邑〉，同上）

行役風霜久，鄉園夢想徒。（〈久戍邊城有懷京邑〉，同上）

也許是因為帶罪效身，所以這些詩沒有貶謫詩人的騷怨。調露元年冬（六七九），駱賓王又因罪入獄，一年後貶臨海（今浙江臨海）丞。¹⁷至光宅元年（六八四）徐敬業起事，駱賓王在臨海丞上恐有三年之久，可確考的詩有〈久客臨海有懷〉一首，然並未寫被貶的心情，倒是繫獄的一年當中，寫了數首詩，抒發含冤入獄的幽憤，如〈獄中書情通簡知己〉、〈在獄詠蟬〉等是，這些詩鋪陳含冤的心情和被囚的幽憤，連繫隨後的被便貶，當然也是廣義的貶謫詩。

王、駱之外，初唐詩人中，最有名的貶謫事件，要屬中宗神龍元年（705）年，十八位朝臣之貶流了。神龍元年正月，武后病篤，宰臣崔玄暉、張柬之等迎太子至玄武門，誅張易之、張昌宗，則天遜位，依附張氏兄弟之朝官十數人皆竄逐，杜審言於此時被貶峰州（屬安南都護府，今越南境），房融流高州（今廣東高州附近），崔神慶流欽州（今廣東欽州），李嶠貶通州刺史（今四川達縣市），劉憲貶渝州刺史（今重慶市），蘇味道貶眉州刺史（今四川眉山），崔融貶袁州刺史（今江

¹⁶ 據清陳熙晉注：《駱臨海集箋注》（台北：世界書局，1981年），頁110，〈詠懷古意上裴侍郎〉詩題注。

¹⁷ 《舊唐書》本傳言其因坐贓，《新唐書》載因上書武后言事，可能坐贓是公開理由，言事遭遣才是實情。參考《唐才子傳校箋》冊一，頁59。

西宜春)，劉允濟貶青州長史（今山東益都），韋元旦貶感義尉（今廣西梧州市西），宋之問貶瀧州（今廣東羅定），閻朝隱流崖州（今海南島海口市附近），王無競亦流嶺外，沈佺期流放驩州（今越南榮市），共十八人被外放或流貶。

十八人之中，崔神慶、閻朝隱無詩，劉憲《全唐詩》卷七十一存詩二十七首，皆為應制詩，王無競《全唐詩》卷六十七存詩七首，未言及貶謫，韋元旦《全唐詩》卷六十九存詩十首，亦皆應制詩，劉允濟《全唐詩》卷六十三存詩四首，無貶謫詩，蘇味道《全唐詩》卷六十五存詩十六首，亦不言貶事。

李嶠雖被貶通州，但據《舊唐書·中宗紀》，神龍二年正月即召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七月為中書令，可能到貶所不久即召回，因之《全唐詩》李嶠五卷（卷五十七—六十一）詩中竟無一詩言及貶事。玄宗即位，宮中查獲李嶠在中宗初崩時請處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的密表，玄宗因此敕令李嶠隨子赴虔州（今江西贛州市）刺史任，隨後又起為廬州（安徽合肥）別駕而卒，這一次出官，李嶠已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因此也未留下任何詩篇。

除沈佺期、宋之問之外，諸人詩中言及貶官的僅有杜審言、崔融、房融、鄭愔。這些詩人中，其貶謫詩大抵皆以思鄉為主調，最多再加上異地風俗殊異之嘆，貶謫詩的數量也十分有限。但貶謫詩到了沈、宋手中就十分不同，他們多方開拓了貶謫詩的面向和情感內涵，在詩作數量上也十分可觀，我們先看兩人被貶之經歷。

沈佺期（？—七一三？），字雲卿，相州內黃人，《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傳中，《新唐書》卷二百〇二文藝傳中有傳，上元二年與宋之問同榜進士，歷通事舍人（七〇〇年）、考功員外郎（七〇一年）、給事中（七〇二年），神龍元年（七〇五年）春，因依附張氏兄弟被流驩州，到神龍三年秋八月承恩北歸。¹⁸又官中書舍人，太子詹事，直到開元初去世。

沈佺期被流放期間，留下了二十四首相關詩作，大多是往返流地的紀行詩，這些詩寫嶺外風光，描述途程艱辛，也寄寓了被放及遇赦的憂樂起伏，情感真摯，或古體或近體，絕對是沈詩中的珠玉，是詩窮而後工的最好例證，並舉兩首以見一斑：

昔傳瘴江路，今到鬼門關。土地無人老，流移幾客還。自從別京洛，顏鬢

¹⁸ 見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卷一所考。

與衰顏。夕宿含沙裡，晨行岡路間。馬危千仞谷，舟險萬重灣。問我投何地，西南盡百蠻。(〈入鬼門關〉)¹⁹

流子一十八，命予偏不偶。配遠天遂窮，到遲日最後。水行儋耳國，陸行雕題藪。魂魄遊鬼門，骸骨遺鯨口。夜則忍飢臥，朝則抱病走。搔首向南荒，拭淚看北斗。何年赦書來，重飲洛陽酒。(〈初達驩州〉二首之二，頁97)

第一首紀行詩寫對前途的茫然和行路之難，鬼門關在今廣西北流縣，《新唐書》地理志四記其他諺語云：「鬼門關，十人九不還。」可見其他之荒蠻，古代流人死於放逐地者不計其數，晚唐武、宣時期的詩人項斯有一首〈哭南流人〉寫盡了流人客死南荒的可悲，詩云：「遙見南來使，江頭哭問君。臨終時有雪，旅葬處無雲。官庫空收劍，蠻僧共起墳。知名人尚少，誰為錄遺文。」(《全唐詩》卷五五四)旅途的艱苦，流地的寂寞，使沈佺期將生活的希望寄託在遇赦回京，〈初達驩州〉之二正是這種心情的寫照。

宋之問(?—七一二?)，²⁰字延清，汾州(一云虢州弘農)人，《全唐詩》卷十九存其樂府雜曲三首，卷五十一—五十三存其詩一百九十八首。宋之問上元二年(六七五)登第後累官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等官，過了三十年稱觴獻壽的宮廷詩人生活，直到張易之兄弟敗，才在神龍元年貶瀧州。在京時期，他與沈佺期並峙，被後人稱為沈宋，和陳子昂及楊炯、駱賓王、杜審言等都有交往，所作詩文雖多為酬答應制，但技巧純熟，格律嚴整，為唐五言律詩的定型貢獻良多，

¹⁹ 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87，以下引詩皆據此書，僅標頁碼。

²⁰ 《舊傳》云：「先天中，賜死於徙所。」先天只有兩年(七一二—三)，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七一三)，玄宗於七一二二年即位，改元先天，是之問當死於七一二二年或七一三年。但《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酷吏傳下周利貞傳載：「周利貞與薛昶、宋之問同賜死桂州驛。」《新唐書》卷二百〇九酷吏傳載周利貞開元二年授夷州刺史，未幾，又授黔州都督，貶邕州長史，賜死梧州。如果周利貞開元二年後又幾經任官才賜死，則與之問同賜死之問當死於開元之後數年，史書所載，兩者必有一誤，據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卷一頁95所考，當是〈周利貞傳〉有誤。

所以清錢木庵《唐音審體》說：「律詩始於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備。」²¹

之問貶瀧州後，第二年即承旨召還京師，²²回京後，依附太平公主。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為太平公主所疾，藉口宋之問知貢舉時受賂，向中宗舉發，景龍三年（七〇九）歲暮，之問再度被貶越州，²³在越期間，「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新書》本傳）今考宋集，越州所作詩約二十五首，寫禹廟、禹穴、鏡湖、若耶溪、法華寺、雲門寺等名勝。在越不到一年，睿宗景雲元年秋（七一〇），之問被流欽州（今廣西欽州），這次被流放，《新書》本傳說是因「獯險盈惡」，《資治通鑑》卷二百〇九景雲元年六月所載較為合理：「坐諂附武、韋，皆流嶺表。」蓋因依附武三思、韋后，故與饒州刺史冉祖雍皆貶到更荒遠的嶺表。之問於秋日溯長江至江陵，復溯湘江赴嶺南，²⁴玄宗立，之問被賜死於嶺南。²⁵

²¹ 郭紹虞編：《清詩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781。

²² 《兩唐書》及《唐才子傳》卷一皆云之問逃歸，匿洛陽張仲之家，然之問詩有〈初承恩旨言放歸舟〉云：「一朝承凱澤，萬里別荒陬，去國雲南滯，還鄉水北流。淚迎今日喜，夢換昨宵愁。自向歸魂說，炎荒不可留。」（此詩《全唐詩》未收，見於明人編《詩淵》，頁1498）可知是承旨北歸，宋兩放嶺南炎方，第二次即賜死，此詩只可能是第一次貶後獲赦之作。又《兩唐書》及《資治通鑑》卷二〇八神龍二年三月載宋北還後張仲之與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然據之問〈渡漢江〉詩，他是在「經冬復春」在神龍二年春末才離貶所，而張、王在三月已因謀弑武三思受審，可見藏匿張仲之家及揭發陰事皆非事實。詳見楊墨秋：〈宋之問研究二題〉，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3期，頁26-30。

²³ 宋之問〈在桂州與修史學士吳兢書〉具言貶越之因，見《全唐文》卷二百四十（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2433-34。

²⁴ 參見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下冊所附〈沈佺期宋之問簡譜〉，頁806。

²⁵ 《舊唐書》卷一百九十文苑傳中宋之問本傳載：「睿宗即位，以之問嘗附張易之，武三思，配徙欽州。先天中，賜死於徙所。」據此，之問當於七一二年卒於欽州，然《新唐書》卷二百〇二文藝傳中宋之問本傳云：「睿宗立，以獯險盈惡詔流欽州……【與冉祖雍】並賜死桂州。」又《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下酷吏傳周利貞傳云：「無何玄宗正位，利貞與薛昶、宋之問同賜死於桂州驛。」史傳所載卒年大體相近，卒所則異。宋人葛立方對宋賜死桂州之說已提出質疑，所著《韻語陽秋》卷六云：「史載宋之問冉祖雍並賜死於桂州……考之文集……【之問】又有發藤州及昭州二詩，二州皆在桂州之南，則賜死之地，非桂州明矣，豈史之誤矣。」（台北：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今

宋之問第二次到嶺南，是被流放。在唐代，罪分五等，流刑僅次於死刑，所以之問這次流放嶺南，心情上和第一次被貶官瀧州及貶越州大不相同。第一次貶官瀧州時，雖然思鄉戀國，但對返京仍抱著希望，果然不久就承旨北歸，但第二次流欽州，他則寫了許多流人共有的憂懼心情，對歸鄉則不存奢望。

兩次到嶺南，之問共有四十餘首詩，加上越州時期所作約二十五首，佔了全部詩作三分之一。在這些貶謫流放時期所寫的詩作中，之問將山水與抒情結合起來，通過自然景物的刻畫來展現詩人的感情世界，是流放文學的精品，其藝術成就遠高於早期的應制詩，這當然是因為生活與心境變遷所帶來詩作風格的驟變，前人已注意及此，如鄭振鐸云：「沈宋之詩，至流徙而尤工。」²⁶劉大杰說他們（沈宋）的作品，到了貶謫以後，皆抒情真摯，技巧精美。²⁷

我們認為沈、宋在貶謫詩上的創新與對前人的超越，至少有數點：

一、在詩中積極抒發被貶的冤屈不平和憤悶：

在沈、宋之前，謝靈運出守永嘉，當然是因為政治上的爭權和排擠，王勃被逐，只因檄雞之遊戲文章，但是他們都未在詩中作不平之鳴，甚至與沈、宋同被貶的僚友中，我們也看不到多少幽憤，唯獨沈、宋二人，敢於在詩中屢言冤屈，為自己的清白申辯，這不能不說是他們的膽識與自信，本來，在政爭之中，朝臣各為其主，沒有所謂對錯。武后死後，人亡政息，做為武后的舊臣，被逐遠地，自然會有不甘之情，沈佺期在被貶驩州之際，就有多首詩力陳自己之清白與蒙冤，

人劉振姪〈宋之問兩謫嶺南新考〉（《文學遺產》1988年6期）及〈宋之問研究的幾點質疑〉（《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2期），以為宋之問流嶺南後，由於王峻的庇護，他在桂州留下來，直到先天元年，王峻調離桂州，宋不得已才向欽州進發，至於宋之死地，劉文則認為「至今是一個謎。」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採用《舊傳》卒於欽州之說。然譚優學〈宋之問行年考〉（見其《唐詩人行年考·續編》（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採卒於桂州說；陶敏〈宋之問卒於桂州考〉（載《文學遺產》2002年2期），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匯編·職方典》卷一百〇四十三載桂州城南元山觀有宋之問宅，又據柳開〈元山觀記〉云宋之問歿後，其夫人孫氏捨宅為觀，亦認為宋死於桂州。

²⁶ 鄭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台北翻印本，未著錄出版日期），頁301。

²⁷ 劉著《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5月新一版），頁424，另一章繼光：〈宋之問貶嶺南詩論〉亦有類似的看法，可惜這些評論都點到為止，不夠深入，章文載《求索》1999年5期，頁98-101。

如〈赦到不得歸題江上石〉有句云：

自幼輸丹懇，何嘗玷白圭。承言竄遐魅，雪枉間深狴。墳壟無由謁，京華豈重躋。(頁 104)

詩極言自己清白而遭流放，以致無由歸謁祖先墳壟，何況是回朝任官。又〈答魑魅代書寄家人〉有句云：

一朝貽厚譴，五宅竟同防。兇豎曾驅策，權豪豈易當。欵顏因侍從，接武在文章。且懼威非贊，寧知心是狼。身猶納履誤，情為覆盆傷。可歎緣成業，非關行昧藏。(頁 108)

此詩首言自身仕歷，蒙恩得為三省郎官，不想一朝獲罪，竟遭流放如夏禹時之防風氏，自己實因修撰書籍才與權臣交接，不想竟成瓜田李下之嫌，身繫牢獄，凡此皆因緣成業果，實非自己之行事晦藏也。再如〈從驩州廨宅移住山間水亭贈蘇使居〉有句云：

死生離骨肉，榮辱間朋遊。棄置一身在，平生萬事休。鷹鷂遭誤逐，豺虎怯真投。憶昨京華子，傷今邊地囚。(頁 117)

詩言因獲罪致使親朋乖離，自己僅以身免，但已萬事皆休，實如鷹鷂豺虎之被逐，何昔日京華之客，今時乃為流邊之人也？

宋之問神龍元年被貶瀧州參軍，路經南昌，有〈自洪府舟行直書其事〉詩自云禍起無由：

問余何奇剝，遷竄極炎鄙。揆己道德餘，幼聞虛白旨。貴身賤外物，抗跡遠塵軌。朝遊伊水湄，夕臥箕山趾。妙年拙自晦，皎潔弄文史。謬辱紫泥書，揮翰青雲裏。事往每增傷，寵來常誓止。銘骨懷林丘，逆鱗讓金紫。安位覺潛構，退耕禍猶起。棲巖實吾策，觸藩誠內恥。濟濟同時人，台庭鳴劍履。愚以卑自衛，兀坐去沉滓。迨茲理已極，竊位申知己。群議負宿心，獲戾光華始。黃金忽銷鑠，素業坐淪毀。浩歎誣平生，何獨戀粉梓。

浦樹浮鬱鬱，皋蘭覆靡靡。百越去魂斷，九疑望心死。(頁 423)

此詩首言平生以謙退隱遁自持，因文章而致青雲，不想一朝獲罪，清白之譽，毀於一旦，嶺南偏遠，望之心死矣。在〈早發大庾嶺〉詩中，宋之問再次重申自己的清白：

歌鞍問徒旅，鄉關在西北。出門怨別家，登嶺恨辭國。自惟勛忠孝，斯罪懵所得。皇明頗昭洗，廷議日昏惑。兄弟遠淪居，妻子成異域。羽翮傷已毀，童幼憐未識。(頁 429)

對於自己的獲罪，宋之問不忍苛責中宗，而歸之於廷議，但對於不明不白獲罪，他似乎耿耿不能或忘，窮愁之情，見於辭句，妻子離居，更爲可傷。〈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一首則表達了到嶺南後，舊友不得相見的惆悵及身死貶所的恐懼，詩云：

逐臣北地承嚴譴，謂到南中每相見。豈意南中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雲搖雨散各翻飛，海闊天長音信稀。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頁 429)

沈宋這些貶謫詩可謂前無古人，雖說其情感模式承襲自屈賈，但沈、宋畢竟是以詩歌體裁表達蒙冤之愁鬱的先鋒。其後，唐代的詩人承沈、宋餘緒，不乏這類的作品，但他們大都借屈賈之事來澆胸中塊壘，鮮少如沈、宋強力爲自己辯白，如柳宗元〈游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云：「神明固浩浩，眾口徒嗷嗷。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全唐詩》卷三五二)劉禹錫〈競渡曲〉云：「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楊桴擊節雷闐闐，亂流齊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鬣鬣動，蟬螭飲河形影聯。刺史臨流褰翠幃，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未至銜枚顏色沮。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綵旂夾岸照蛟室，羅襪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全唐詩》卷三五六)另劉禹錫在詩文中用賈誼貶長沙的典故達十次之多。李白〈放後遇恩不霑〉：「獨棄長沙國，三年未許回。何時入宣室，更問洛陽才。」(《全唐詩》

卷一八四)劉長卿〈新年作〉云:「已似長沙傳,從今又幾年。」²⁸又〈長沙過賈誼宅〉:「三年謫宦此棲遲,萬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獨尋人去後,寒林空見日斜時。漢文有道恩猶薄,湘水無情弔豈知。寂寂江山搖落處,憐君何事到天涯。」(《全唐詩》卷一五一)戴叔倫〈過賈誼宅〉:「一謫長沙地,三年歎逐臣。上書憂漢室,作賦弔靈均。舊宅秋荒草,西風客薦蘋。淒涼回首處,不見洛陽人。」(《全唐詩》卷二七三)王建〈贈謫者〉:「何罪過長沙,年年北望家。」(《全唐詩》三〇一)卷屈原、賈誼皆以才高被貶,而他們被貶後的愁悶和不平,也成了唐代貶謫詩人常有的情感模式。

二、在詩中寄託戀君思闕之情及蒙恩赦還之願：

沈、宋之前或同時代的流貶詩人,鮮少如他們兩人對於重返京闕有那麼高的期待,以致詩中再三致意,念念不忘。在這一點上,沈、宋二人在貶謫詩的寫作上,也是具有創新及典範的意義,為盛唐以下的貶謫詩人,立下了可以景行的先例。沈佺期長流驩州,途中及在貶所之作,如〈遙同杜員外審員過嶺〉、〈初達驩州〉二首、〈嶺表寒食〉、〈三日獨坐驩州思憶舊遊〉、〈答愛州報赦〉、〈遇赦〉等無不抒發對京華的眷戀,對重謁明君的想望及遇赦的歡。試看〈遙同杜員外審員過嶺〉一首：

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
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雁幾群?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
(頁 85)

這是一首格律圓熟的七律。沈、宋五律之作率皆合律,沈佺期五律共六十三首,有失粘失對或雜古詩平仄者僅六首,宋之問五律共七十五首,有不合律之詩句者十六首,所以前人以沈、宋為律詩龜鑑。²⁹沈、宋不僅在五律之格律上立下典範,

²⁸ 此詩或作宋之問詩,實為劉長卿詩,四部叢刊影宋本《劉隨州集》收入,今人楊世明:《劉長卿集編年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斷為劉作,認為是貶南巴時所作,見頁222;儲仲君:《劉長卿編年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45,亦收此詩,但認為是貶睦州時所作;另佟培基:《全唐詩重出誤收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引傅璇琮之說,定為劉長卿在嶺南時作,見頁38。

²⁹ 見皎然:《詩式》,卷二,張伯偉編撰:《全唐五代詩格校考》(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七律在他們手中，也已是平仄合拍了，即以上引〈遙同杜員外審員過嶺〉詩而言，全合於七律格律標準，第七句「餘」字應仄作平，故以「萬」字救轉，屬當句自救。

杜審言與沈佺期同時被貶，杜貶峰州，亦在五嶺之表。這首詩原是和杜審言之作，惜杜詩已佚，不知原作是否亦為七律，蓋初唐人和詩多和意，中唐以後及宋人始有依韻、次韻之作也。詩首言離家赴嶺外，又與朋友分離之不堪，次聯寫五嶺之瘴癘與京洛風光相去絕遠，人浮漲海，更不似雁子年年可以北返，嶺南與京洛遙隔，重見明君之日，似遙不可期。又〈初達驩州〉之一云：

自昔聞銅柱，行來向一年。不知林邑地，猶隔道明天。
雨露何時及，京華若個邊。思君無限淚，堪作日南泉。(頁 95)

銅柱為馬援南征在交趾所立界標，林邑、道明皆越南古國名，日南為漢郡名，即唐驩州，詩言驩州邊遠，不知皇恩雨露，何時可到，然自己思君之淚，以足作日南之泉水矣。望赦及思君之情宛然，和〈初達驩州〉第二首之「何年赦書來，重飲洛陽酒」及〈嶺表寒食〉之「帝鄉遙可念，腸斷報親情」同調。果然，沈佺期在驩州一年多就遇赦，他在〈答寧愛州報赦〉中說：「質幸恩先貸，情孤枉未分」，表達對皇帝恩赦的感念，又在〈喜赦〉一首中，寫出他重獲新生的欣喜之情，詩云：

去歲投荒客，今春肆耆歸。律通幽谷暖，盆舉太陽輝。
喜氣迎冤氣，青衣報白衣。還將和浦葉，俱向洛城飛。(頁 124)

投荒經年而遇赦，心情如覆盆舉而見陽光，返洛之歸情，則急如飛箭矣。

我們再看宋之問初貶瀧州時如何抒寫他思君戀闕的情懷及望歸之渴切，〈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一首云：

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
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頁 421)

按黃梅在今湖北，距長江百里，宋之問當是自洛陽取道運河入江，過鄱陽湖後沿贛水度大庾嶺到瀧州貶所。崔融同被貶袁州（江西宜春），所經道路相同，不知緣何未能同行。³⁰崔融和詩今見於《唐詩紀事》，題作〈和宋之問寒食題黃梅臨江驛〉，詩云：

春分自淮北，寒食渡江南。忽見潯陽水，疑是宋家潭。
明主闇雞叫，孤臣逐未堪。遙思故園陌，桃李正酣酣。³¹

崔融詩中表達的是對皇帝的失望和被逐的不堪，相反的，宋之問對中宗卻仍視之如指引方向、不可移易的北極星。〈度大庾嶺〉一詩，則拳拳敘寫遇赦歸鄉之殷望，詩云：

度嶺方辭國，停輶一望家。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
山雨初含霽，江雲欲變霞。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頁 428）

賈誼少年得志，卻為周勃、灌嬰所讒，謫為長沙王太傅。宋之問自比賈誼，自有蒙受冤屈之慨嘆，然這種冤屈，在赦還有日的前提下，是可以一筆勾消的，即此可見他望歸之切。

沈、宋這種在貶謫詩中鋪寫思君戀闕之情及望歸之願的模式，也成為後來唐代詩人貶謫後抒情的規臬。唐代之前，著名的貶謫詩人如謝靈運，一次由京城出為永嘉太守，一次由故鄉會稽調為臨川內史，但皆未對京闕或君王有如此深切的依戀。謝朓出為宣城太守，也未見類似情感的抒寫，這可能和唐朝科舉取士，讀書人捨仕途無有更好人生歸宿有關，因此對帝王恩澤、擢用的依賴要比六朝有門第庇蔭者自是不同。但不管如何，沈、宋貶謫詩中對京闕皇都甚或君主恩赦的期盼，已為後來者立下創作的典範，我們看鄭愔、李白、戎昱等皆有相似的詩作。李白〈流夜郎贈辛判官〉：「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全唐詩》卷一七〇）鄭愔被武后貶官後，追憶京華，在〈貶降至汝州廣城驛〉詩中有言：「曉

³⁰ 宋之問有〈自洪州府舟行直書其事〉，寫於赴貶所途中，知此行舟行經洪州（南昌），沿贛水過大庾嶺。

³¹ 計有功：《唐詩紀事》卷 8，頁 109。

裝違鞏洛，夕夢在長安。」（《全唐詩》卷一〇六）戎昱〈謫官辰州冬至日有懷〉云：「去年長至在長安，策杖曾簪獬豸冠。此歲長安逢至日，下階遙想雪霜寒。夢隨行伍朝天去，身寄窮荒報國難。北望南郊消息斷，江頭唯有淚闌干。」（《全唐詩》卷二七〇）皆是被貶後不忘在京之日，並寄望重返。

三、藉佛道山水排譴被貶之愁苦

南朝謝靈運被貶出守永嘉之後，每於詩中表現退隱山林之心願，王勃被逐出沛王府，居蜀三年，除嘆飄泊之苦外，寫得最多的是思鄉的情感，駱賓王因事被罪，從年邊塞後，也多寫去國懷鄉之思。沈、宋的貶謫詩在去國懷鄉的抒寫上，和前人是相同的，但藉佛道山水來排譴放逐的鬱悶，以佛理自求解脫，恐怕是兩人在貶謫相關的詩歌上之創新，也下啓了王維、柳宗元、劉禹錫等人被貶後抒情模式。試看沈佺期〈九真山靜居寺謁無礙上人〉：

大士生天竺，分身化日南。人中出煩惱，山上即伽藍。小澗香為剎，危峰石作龕。候禪青鶴乳，窺講白猿參。藤愛雲門壁，花憐石下潭。泉行幽供好，林掛浴衣堪。弟子哀無識，醫王惜未談。機疑聞不二，蒙昧即朝三。欲究因緣理，聊寬放棄慚。超然虎溪夕，雙樹下虛嵐。（頁 93-94）

此詩為沈佺期流驩州途中，道出愛州日南縣，訪無礙上人之作。詩前半稱賞無礙上人說法高妙，禽獸亦受感化，所居靜居寺林泉幽美，花木令人憐愛。後半自言鈍於佛理，不識法門，但願依上人深究因果，以解被放逐之殘心，於佛寺清靜之所，能禪入超然之境。又〈紹隆寺〉一詩，亦驩州時所作，詩云：

吾從釋迦久，無上師涅槃。探道三十載，得天南端。非勝適殊方，起誼世歸難。放棄乃良緣，世慮不曾干。香界縈北渚，花龕隱南巒。危昂階下石，演漾窗中瀾。雲蓋看木秀，天空見藤盤。虛俗勤宴坐，居貧業行壇。試將有漏軀，聊作無生觀。了然究諸品，彌覺靜者安。（頁 125）

詩首言自己心慕佛道已久，不想在流放棄逐之餘，反而因緣和合，靜處邊隅，世慮不到，接著詩人盛稱紹隆寺依山傍水，花木扶疏，於此清靜之所，實可堪破無生無死之理，讓人思慮皆去，不為放逐而煩惱。又〈登韶州靈鷲寺〉有句云：「對

水禪應定，論沙幼已深。」(頁 131)，「幼」字陶敏校注以為當作「劫」，甚是。此兩句蓋言靈鷲寺地靜可以入禪，已之被貶，如墮入劫波，已有時日矣。凡此，皆沈佺期在貶謫之後，藉佛理以自寬之作也。

宋之問被貶瀧州途中，道出南昌，有〈自洪府舟行直書其事〉，也曾欲藉佛理及嶺南山水自求解脫，詩中有句云：

百越去魂斷，九疑望心死。未盡匡阜遊，遠欣羅浮美。周旋本師訓，佩服無生理。異國多靈僊，幽探忘年紀。(頁 424)

羅浮山在今廣東增城，相傳為蓬萊之一島。洪府地近匡廬，宋以遠貶之人，未能暢遊，但欣嶺南有羅浮仙山，可以周旋佛道，參悟無生無死之至理，則年紀都忘，何況貶謫之小事乎？宋之問到了韶州，又拜見了曾被武后召入宮中的六祖惠能禪師，寫詩表達了皈依佛法的願心，題曰〈自衡陽至韶州謁能禪師〉：

謫居竄炎壑，孤帆森不繫。別家萬里餘，流目三春際。猿啼山館曉，虹飲江泉霽。湘岸竹泉幽，衡峰石困閉。嶺嶂窮攀越，風濤極沿濟。吾師在韶陽，欣此得躬詣。洗慮賓空寂，焚香結精誓。願以有漏軀，聿薰無生惠。物用益沖曠，心源日閑細。伊我獲此途，游道迴晚計。(頁 547)

和前一首詩一樣，宋之問在詩中表達了因禍得福，因謫居而得與聞佛理的欣慰，並重申獻身空寂之願，比之在廟堂獲罪，皈依佛法自是全身之計。能皈依至道，則別離年久，又何苦之有，故詩以「不作別離苦，歸期多年歲」作結，實是以佛法暫時自寬耳。沈、宋這種以佛道自遣的方式，也為後來貶謫詩人如王維、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所繼承。

王維經歷安史之亂，僅以身免，因弟王縉自願降階減秩相贖，得免死罪，但從此隱居藍田輞川，與道友裴迪，彈琴賦詩，過著「晚年唯好靜，萬事不關心」(〈酬張少府〉)的生活。白居易被貶之後亦然，《舊唐書》卷一百一十六白居易傳載：「望風為當路者所擠，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淪蠻瘴，自是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情性為事。」晚年更結香火社於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劉禹錫說他：「吏隱情兼遂，儒玄道兩全。」(〈酬樂天醉後狂吟十韻〉《全唐詩》卷三六二)。柳宗元、劉禹錫被貶之後，也都潛心佛典，與僧徒密切往來，他們交往的

方外有浩初、元暉、琛上人、慧則、廣宣、徹公等不下十餘人，並為僧人佛事寫下大量碑、銘、記、贊等文字，翻檢兩人文集便知。柳宗元在詩中也多次提到對佛徒生活的喜悅，如〈晨詣超師院讀禪經〉詩云：「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閒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真源了無取，妄跡世所逐。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日出霧露餘，青松如膏沐。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全唐詩》卷三五十一）劉禹錫〈謁柱山會禪師〉詩云：「靜見玄關啓，歆然初心會。夙尚一何微，今得信可大。覺路明證入，便門通懺悔。悟理言自忘，處屯道猶泰。色身豈吾寶，慧性非形礙。思此靈山期，未卜何年載。」（《全唐詩》卷三五五）貶謫詩人在佛教的清靜中暫時找到了內心的安寧。其次，貶謫詩人也經常藉山水寄託鬱結寂寞，柳宗元是最為人熟知的例子，所以元好問〈論詩絕句〉評柳云：「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弦一拂遺音在，卻是當年寂寞心。」試看其〈南澗中題〉：「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中國傳統士大夫仕宦中遭遇挫折，隱遁往往成爲另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孔子已有乘筏浮海之嘆，謝靈運有會稽山水，淵明有桃花源可尋，魏晉世人則多飲酒服藥以避世，但不管阮籍、嵇康或謝靈運、陶淵明詩中，我們都較少看到佛教的影響，以佛理來排遣貶謫之心情的，在中國詩歌史上，沈、宋應是憂然獨創，也給後來的詩人作了很好的示範。

參、結論

本文首先論述了唐代仕宦文人被貶的一般情況，說明貶謫在唐朝是很多詩人的普遍經驗，也往往影響了詩人作品的風格，被貶詩人，大都以詩傳達貶途的苦辛和對家園親友的思念。在這一方面，沈、宋和其他詩人並無不同，但沈、宋的貶謫詩卻至少在三個面向突出了他們與眾不同的創新，並成爲後來貶謫詩的典範，一是在詩中積極抒發被貶的冤屈不平和憤悶，二是在詩中寄託戀君思闕之情及蒙恩赦還之願，三是藉佛道山水排遣被貶之愁苦。

引用文獻

- 《中國文學發展史》，民國，劉大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1版。
- 《杜甫年譜》，四川文史管理委員會編，台北：學海出版社，1981【1958】年，1版。
- 《全唐五代詩格校考》，張伯偉編撰，民國，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版。
- 《全唐詩重出誤收考》，民國，佟培基，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版。
- 《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民國，陶敏、易淑瓊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1版。
- 《初唐四傑研究》，民國，駱祥發，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年，1版。
- 《唐人行第錄》，民國，岑仲勉，北京：中華書局，2004【1962】年，1版。
- 《唐才子傳校箋》，民國，傅璇琮主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1987】年，1版。
- 《唐詩人行年考·續編》，民國，譚優學，成都：巴蜀書社，1987年，1版。
- 《唐詩紀事》，宋，計有功，台北：木鐸出版社，無出版日期。
- 《清詩話》，民國，郭紹虞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版。
- 《劉長卿集編年校注》，民國，楊世明，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1版。
- 《駱臨海集箋注》，清，陳熙晉注，台北：世界書局，1981年，再版。
-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民國，鄭振鐸，台北翻印本，未著錄出版日期。
- 《劉長卿編年箋注》，民國，儲仲君，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1版。
- 《隋唐五代文學史》，民國，羅宗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1版。
- 《謝靈運集校注》，民國，顧紹柏校注，台北：里仁書局，2004年，1版。

引用單篇論文

- 〈古代貶謫文學探析〉，徐書奇，載《文學研究》，2005年9期。
- 〈宋之問卒於桂州考〉，陶敏，載《文學遺產》，2002年2期。
- 〈宋之問貶嶺南詩論〉，章繼光，載《求索》，1999年5期。
- 〈宋之問研究二題〉，楊墨秋，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3期。
- 〈宋之問兩謫嶺南新考〉，劉振姬，載《文學遺產》，1988年6期。
- 〈宋之問研究的幾點質疑〉，劉振姬，載《廣西教育學院學報》，2000年2期。

〈湖湘貶謫文學研究展望〉，陶敏，載《求索》，2001年6期。

〈駱賓王生平考辨〉，駱祥發，載《唐代文學論叢》，1982年2期。

〈唐藍田武關道驛程考〉，嚴耕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下冊。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motional Poems of the Shen and Su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Tsai, Chen-nien*

[Abstract]

Demotion and Exile are common in Chinese History. As early as in the era of Yao and Shun, Chinese Classics have recorded people who were expelled from the royal court and put into extreme frontier. From then on, demotion and exile were officials often experienc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fficial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poetical works and emphasizes that the demoted official often used poems to express their sufferings during their time of exile. They narrate their thinking of their family and the hardship of travel in their writings. Shen Ch'uan-ch'I and Sung Chih-wen are the forerunner of demoted poet in T'ang dynasty whose poems are typical in the sub-genre of demotion and exile. First, they use poems to show their mental pain and suffocation. Second, they entrust their thinking of the emperor to the poems. Third, they write about their melancholy in their lyrical works.

Keywords: Demotion, Exile, Sung Chih-wen, Shen Ch'uan-chih, Crea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